

第四章

鎖定清晰目標

駱鏗祥神父

香港教區司鐸



Rev. Ferdinand Lok Hung Cheong

近年來，堂區出現了很多年青人自動自發的活動，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現象。天主聖神不斷在教會內工作。何需我們擔憂？

第四章 鎖定清晰目標

香港教區司鐸駱鏗祥神父

(Rev. Ferdinand Lok Hung Cheong)	151
(一) 打鐵趁熱	153
(二) 觀塘懷舊	154
(三) 接班人語	158
(四) 感謝恩師的安排	162
(五) 談香港仔聖神修院的日子	165
(六) 培育聖召文化	168

香港教區司鐸 駱鏗祥神父
Rev. Ferdinand Lok Hung Cheong



主的晚餐我牧我羊，駱鏗祥神父
為教友送聖體。



駱鏗祥神父獲教友熱烈歡迎，感到又驚又喜。



駱神父為兒童付洗，慶祝信德的延續。



駱鏗祥神父及恩保德神父在2012信德年，於聖若翰堂鹽田梓朝聖之旅。



駱鏗祥神父與作者鍾炳基合照。



駱神父見證著年青人自動自發的活潑氣氛日漸濃厚。



聖若翰堂和小學在九龍觀塘宜安街的街角，1959年開始服務社區，五十多年從未間斷。

(一) 打鐵趁熱

2014年9月，趁著歡送余理謙神父(Rev. James Hurley, S.J.)的機會，我把剛剛完成的四個傳教士的故事，帶回香港給教區歷史檔案處主任夏其龍神父過目，他不但願意在百忙中肯抽空把原稿仔細批閱，還給我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同時也鼓勵我不妨依照原來六個故事的計劃，再加多訪問兩位國籍神父，這樣會令故事更多層次，結構更為紮實。

俗語說：打鐵趁熱，我立刻致電給幾位心目中的人選，包括駱鏗祥神父和余福綿神父，但我離開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已有四十年，是名副其實的「海龜」，從海外歸來，在香港人地兩疏，要貿貿然上門找神父做甚麼訪問，肯定有困難。其實去年做第一節的訪問時，已經有過不少吃閉門羹的經驗，現在面皮加厚了，就不怕碰釘子，幸虧皇天不負有心人，讓我遇到熱心的聖若翰堂區秘書長郭太的深明大義，不但順利替我約好了駱鏗祥神父，由於當時適逢國慶假期，員工放假，她更悉心為我安排行程及指路，謹此致謝！

(二) 觀塘懷舊

香港教會在過去百多年來，一直以行動來宣揚基督福音的博愛精神，服務廣大市民，傳教修會在社會各方面的貢獻尤其多不勝數。

從50年代大批大陸難民湧到香港開始，到60年代徙置區出現，取代了木屋區，然後70年代政府以大幅填海來增添土地，工業飛躍發展，工廠大廈及屋邨林立。再到80、90年代以至今日，教會的神父、修士、修女，莫不日以繼夜，以志願團體及義工身份，站在貧民中間為人口密集的週邊地區，免費提供教育、醫療、就業、住屋、食物等服務。

從網站或地圖上看，聖若翰堂區的地址明顯位於觀塘宜安街的；但堂區秘書長郭太卻教我在牛頭角地鐵站出口。果然，我輕輕鬆鬆的不用走上十分鐘，便到達了聖若翰堂，比預約時間還早了一個多小時。好一個難得的機會，便索性到處逛逛，懷舊一番。觀塘是在70年代香港經濟飛躍時的起跑點，可以想像，聖若翰堂過去四十五年來，在傳教和牧



民工作上的重要地位。

記得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鳴遠天主教中學教書，當年調景嶺地處偏僻，從九龍去，要乘固定班次的巴士，搖搖晃晃個多小時車程，但是調景嶺環境優美，居民過著淳樸的農村生活。學生大部分是寄宿的，也有些每天從港島乘渡海輪過來。另外，學校又為有需要的老師附設一座新穎的宿舍，對我這初出道的教師來說，簡直是個世外桃源。

我在大學唸書時，一向都做兼職，除上門補習之外，又在新蒲崗教一兩晚夜校，所以每星期我總會有些日子要在鳴遠下課後，從調景嶺翻山越嶺，走捷徑到觀塘，再乘小巴飛出九龍授課去。回程時，通常都在新蒲崗或觀塘吃晚飯，有時遇上在大牌檔一起「撐檯腳」的，還是夜校裡剛下課的工友學生呢！

1970年因衛星城市的設立，人口也不斷增加，香港經濟飛躍，不少捱過艱苦日子的貧苦大眾，生活雖然好轉，都有積穀防饑的儲蓄風氣，也爲了下一代去追求更好的理想，都渴望有一天送子女去外國留學，因此年輕人都有半工讀的習慣，很多工人下班後都蜂湧去學習英文、打字、裁剪、織造、車衣、烹飪等，以期增加就業和晉升的機會，當時許多「夜校」都在

天主教學校設立，課程通常都包括宗教常識科。

70年代的香港教會，在傳教和牧民工作上，可以說是進入一個充滿活力的嶄新紀元，教區在梵二精神推動下，一方面為貧苦階層爭取權益，另一方面向工人展開牧民工作。當時在這方面成績最卓越的，要算美國瑪利諾修會的神父、修士和修女了。早在一百年前，他們已經在中國廣東廣西一帶活躍傳教。^{註一}

1950年代，瑪利諾修會神父跟隨中國難民一起逃亡到香港後，就立即不遺餘力地去展開規模龐大的籌款救濟工作，在衣食住行及教育醫療各方面照顧難民的需要，成績斐然。

1970年後，香港工業蓬勃，工業大廈和廉租屋如雨後春筍。在東頭村、茶果嶺、牛池灣、橫頭磡、九龍灣、井欄樹、觀塘、藍田、秀茂坪等地都有瑪利諾神父的足跡，他們陸續建立堂區，開辦中小學及夜校，設立醫療、牧民及職業訓練中心，並參與政府廉租屋及社區建設工作，支持特赦囚犯及人權組織等，甚至有神父直接到工廠上班，體驗勞工生活，親自接觸工人。

聖若翰堂其實是香港教區在1978年從瑪利諾修會手中接管過來的。這一年，瑪利諾修會在美國的總會

宣佈，爲了回應時代的需要，著令所有在香港的瑪利諾會士，全部歸屬主教名下，並逐步退出堂區，交由香港教區的中國神父掌管。^{註二}

聖若翰堂區成立於1959年10月，當時的服務範圍包括茶果嶺、觀塘新區，以及現時的觀塘市區；堂區辦事處設於牛頭角道之內，並附設一診所；主日彌撒在茶果嶺一所私立學校內舉行，經神父和教友各方奔走策劃，三年之後，觀塘的聖若翰堂建成。1962年7月，聖若翰學校校舍也相繼落成，而堂區辦事處也隨之遷入新校舍內。

隨著社區不斷急速發展，觀塘區的教友人數在60年代中期已增至萬餘人，堂區的教務也日益增多，因此教區於1967年6月1日，將聖若翰堂區原來負責的範圍一分爲三，仍由聖若翰堂區負責的範圍包括：東起翠屏道，西至觀塘官立小學，南起海濱道，北至樂意山。^{註三}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聖若翰堂見證了觀塘和牛頭角漸漸由工廠區轉爲商業區，目睹了瑪利諾修會爲居民提供了教育、醫療和職業訓練等服務，也爲數以千計的信友舉行聖事。我們目睹香港教區不斷在信德中成長，能不對瑪利諾修會的神長修士們感恩萬分？

(三) 接班人語

駱鏗祥神父在聖若翰堂擔當了主任司鐸七年，他在1971年晉鐸後，曾經當過八年《公教報》編輯。1986年，在胡振中樞機指示下，駱神父出任教友總會神師的工作，當時他就直覺地感到，傳教士的時代已經過去，外國來的傳教士會越來越少，現在就是中國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時候，香港教區如要順應潮流，教會如要有效地推動福傳使命，當務之急就要積極進行教友的培育。

駱神父對他個人的信念和目標，自始至終，非常清晰。

「我一直都覺得，我做神父的主要使命，是培育教友做福傳工作，教友不但做得到，而且做得好！

「其實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獻已解釋清楚，傳教工作人人有責，並非只是神職人員的任務，教友要在現世實踐基督徒的生活，就要在自己的週遭環境，以個人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肩負起宣揚福音的使命。爲了強調這一點，香港教區於1974年3月，把



「傳教總會」易名為「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正當駱神父和一班教友合力創辦首座教友培訓中心的時候，剛巧當時筲箕灣聖十字架小學校舍荒廢著，駱神父就把教友總會從堅道教區中心搬過去，並計劃在九龍和新界區繼續拓展場地；其後，爲了集中人力和資源，決定留守在港島，而「教友培訓中心」亦漸漸易名為「教友培育辦事處」。

除了教友總會之外，駱神父後來亦因爲教區的需要，義不容辭地肩負起聖十字架堂主任司鐸的職務。

「可以培育教友在自己的環境內做福傳工作，實在是最理想不過的了，對神父來說，還有甚麼比這工作更重要？」

訪問中，駱神父不止一次重申教友福傳與培育的重要性，顯示他始終不渝的熱誠和信念。

教區三十多年來，隨著資訊和科技的進步，經過多方面的嘗試、考驗和改善，教友總會的計劃現在已經開花結果，一系列多姿多采的培育訓練課程和工作坊，提供教友對屬靈使命、領袖潛能、領導技巧、福傳等各方面的培育。比較大眾化的，包括慕道聚會、堂區飯局、教義函授班、網上福傳學校、街頭福傳、視訊媒介製作、揮春、紅封包等福傳物品等，又參與

香港書展、年宵及明愛賣物會。各種活動不但深受堂區內外人士歡迎，相關消息在互聯網上也廣泛流傳。教友總會是由全港各堂區的牧民議會及教區性善會代表組織而成，共有七十八個屬會，他們也邀請嘉賓主持專題講座，鼓勵堂區善會在小團體互相關注，教友間彼此分享。

他們在2015年提出的口號是：「獻身使命承主旨，福傳培育展新姿！」

事實上，據駱神父透露，目前香港福傳工作的成功率非常之高，慕道者和領洗人數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以五十個堂區計算，每年平均最少有三、四千人領洗入教。

「不過，香港雖然每年領洗的人不少，但每年離開教會的也很多，這是十分可惜，所以怎樣跟進及延續培育教友，實在非常重要。領洗是個機緣，入教是天主的恩典，我們做得到的，僅限於接觸他們，提供機會，其餘一切要依賴聖神的幫助。」駱神父謙遜地說。





駱鏗祥神父目標非常清晰：現在就是中國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時候！

（圖片由聖若翰堂攝影組提供）

(四) 感謝恩師的安排

問到駱鏗祥神父的聖召經歷，他不斷感謝恩師薛理覺神父的安排。

「我的聖召有個特點，可以說，未入修院已經度著修道的生活。我本來是在薄扶林道聖安多尼堂做聖母軍的，那時的副本堂，是已故慈幼會薛理覺神父 (Rev. Szeliga, Thomas SDB, 1915 - 2005)。

「薛神父鼓勵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朋友住在一起，去嘗試體驗修道式的小團體生活，當時除了我，還有譚坤、文耀龍、李國雄、鄭生來等人，我們都已經在社會上有穩定的工作，恰巧都是教師，大家志趣相投，當時九龍塘牛津道培聖中學的頂樓是空置的，有幾個房間，所以我們就合資租用了這地方，作為小團體宿舍。

「薛神父不但是一位熱心的慈幼會傳教士，也是一位很愛護香港教區的好神父，尤其是在推廣聖召，扶掖後輩這方面。他認為二十世紀是屬於教區的，修會時代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早已經成為過去的歷



史，爲了前途，香港應該落實注重教區司鐸的培育，薛神父本身雖然屬慈幼會，但他堅持我們要進教區修院受訓，做教區神父。

「薛神父除了定期前來探訪，舉辦靈修活動之外，還經常帶我們去郊外旅行，神父的愛心和智慧，令大家很快就適應這種生活；團體雖然小，但有規律的日程，對我們日後的修院生活卻很有幫助。在薛神父的悉心安排下，本來艱辛狹窄的聖召途徑，順理成章的變成康莊大道，我們這一群由他一手栽培出來的聖召，幾乎百分百升了神父，並且都成了香港教區的中堅分子。

「後來，薛神父曾經回到波蘭退休一段時間，我們這班新紮師兄，也曾組團去探望恩師，相信薛神父在中國傳教超越半個世紀當中，在聖召方面的大豐收，肯定是最令他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吧！」

根據慈幼會中華省會的網站記載，薛理覺神父於1915年3月1日在波蘭Tychy出生，1936年來華傳教。五年後，即1941年9月在香港晉鐸，往後二十多年內，曾服務過廣東省韶州教區、澳門慈幼學校及粵華中學、香港聖類斯中學、港九兩間鄧鏡波書院等。從1955年至1966年，薛理覺神父擔任聖安多尼堂助理司鐸，

1971年往美加為華人服務。2005年2月2日下午二時，薛神父於加拿大省會院逝世，享壽八十九歲。

薛神父一生奉行慈幼會鮑思高會祖聖鮑思高(St. John Bosco, 1815-1888)的精神，在年輕人中捨己忘我，以言以行，樹立起令人難忘的傳教士風範。感恩之餘，駱神父又說：「慈幼會士以鮑思高的口號『予我靈、取其餘！』作為座右銘；這金句天天在我心中迴響。」



(五) 談香港仔聖神修院的日子

駱鏗祥神父進入修院之前，已經和幾位有同一目標的朋友，過著修道式的小團體生活，那麼入修院應該順理成章吧！

「由於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入修院那年，曾經被堂區裡的聖母軍弟兄質問，他們批評我不應該爲了做神父而放棄教學工作，放棄照顧父母的責任，貿貿然離開家庭，這種做法似乎太不近人情了。我努力地給他們解釋，其實這事情我已經跟家人仔細商量過，姊姊也答應，假如父母有甚麼困難，她一定會全力照顧他們的。這一點，教會也有明文規定，如果父母需要我供養，我是絕對不可以做神父的。」

「1964年，教廷傳信部將香港仔華南總修院移交香港教區管理。而原本位於薄扶林太古樓的聖神修院，亦遷入華南總修院一同發展。同年，培聖會在大會堂舉辦首屆教區聖召展覽，介紹了香港各個神職修會，他們所堅持的理想和不斷努力做的種種使徒工作。展覽非常成功，除了吸引了大批善會的青少年之

外，一般市民也非常踴躍參觀，而最令人雀躍的，是當年入修院的人數明顯地增加了。

「大小修院既然合併了，在開學日，小修生百多人、大修生三、四十人一起報到，在家人親友陪同下，把一向清幽寧靜的修院擠得水洩不通，熱鬧非常，我心裡以為聖召進入豐收期了！

「平靜了兩、三個月後，一天早上望完彌撒，大夥兒進入自修室時，我驀然發現，書桌上放著一封信，原來是一位跟我們很要好的同學寫的，他於當日清早，竟不辭而別，悄悄離開修院了！

「修院有規律的團體生活，我們剛剛開始適應，不用說，這突然其來的消息，使我們頓感驚惶失措，有如晴天霹靂，有一段日子不但心裡難過，也感到迷惑，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以為世間上沒有比聖召更容易，沒有比修道更適合我們的了！

「隨後的日子，原來還有許多人陸陸續續的離開修院呢！入五十，出四十五，已經是個很成功的比率，有些甚至『全軍盡墨』，一班十多個修生，不到幾年都人間蒸發了。

「我開始意識到，修道聖召並不是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容易，修道生活也不是人人都適合的，耶穌不是



說過：是我揀選你，不是你揀選我嗎？

「我也曾經見過在大修院同學中，許多天資聰敏的，許多辦事能力高的，許多充滿愛心的，也有許多充滿犧牲精神的，有些被主教保送到大學或外國留學的，也有些外宿走讀的，但大多數都悄然離開修道生活，未能如願成爲神父。

「天主的計劃，跟凡人想法不同，人不能完全明白。這所謂聖召豐年的失收，給教區神長一次很大的打擊和反省機會。事實上，踏入70年代，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全球青年都湧起一股反抗體制 (Anti-establishment) 的熱潮，許多年輕人以反抗權威，對抗主流社會，來象徵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觀念；另一方面，雖然當時香港工業發達，經濟飛躍，但無數家庭仍在貧窮線下掙扎，父母把希望放在子女身上，熱切期望他們有出頭和出國的一天，有些家長甚至把修院和寄宿學校，視爲廉價而優質的教育中心。」

(六) 培育聖召文化

香港教區自從1964年，將聖神修院由薄扶林道的聖神修院遷入香港仔以後，培育神父的成功率卻連年下降，令人擔憂。

駱鏗祥神父對聖召問題有這樣的感想：

「教區檢討和反省之後，深感多年來，在推動及宣傳聖召方面，都嘗試過不同的方式及途徑，然而成績仍差強人意，平均每五年僅有三兩位晉升神父，而且似乎越來越少。

「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在2014年的《聖召月牧函》中，呼籲信眾要從速建立『聖召文化』。湯樞機提出，聖召荒是普世教會的共同問題，而解決的方法，並非單靠針對某類年輕人或團體而言，因為神職與一般職業不同，聖召是一種屬靈使命，是天主給當事人的獨特禮物，接受邀請者，要作出無條件的奉獻。

「追隨聖召除了要有堅強的意志，亦需要相當成熟的思維及性格，並非普通人可以接納。奉獻犧牲的途徑，與現代人急功近利的思想背道而馳，因此推動



及宣傳聖召，亦非一朝一夕可成。

「要共同孕育一種『聖召文化』的氛圍，讓教友明白聖召是甚麼一回事，就必須從紮根信仰著手，把聖召意識帶進每個信友的靈修生活，包括每個公教家庭的信仰培育、神職人員的善表、經常祈禱、參與感恩祭及愛德的事工等。」

駱神父又再三強調教友培育的重要：

「目前，要緩解神父短缺，應付人手不足的問題，就必須不斷培訓教友，積極做福傳工作。近年來，觀塘從以前的工業區轉變為商業區，年長的教友漸漸被年輕的教友代替，堂區出現了很多年青人自動自發的活動，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現象。天主聖神不斷在教會內工作。何需我們擔憂？」

看來，駱神父從晉鐸那天開始，就鎖定一個清晰目標了。

註釋

註一：參閱香港《公教報》教育新聞版。《瑪利諾神父屬校開展中國尋根之旅》。2011年4月24日。

註二：參閱本書第二章第五節訪問任澤民神父的談話：「瑪利諾修會因應時代需要」。

註三：《聖若翰堂簡介》主要資料來自聖若翰堂區網站 <http://sjbp.catholic.org.hk/history.html>。2014年11月9日上載。

